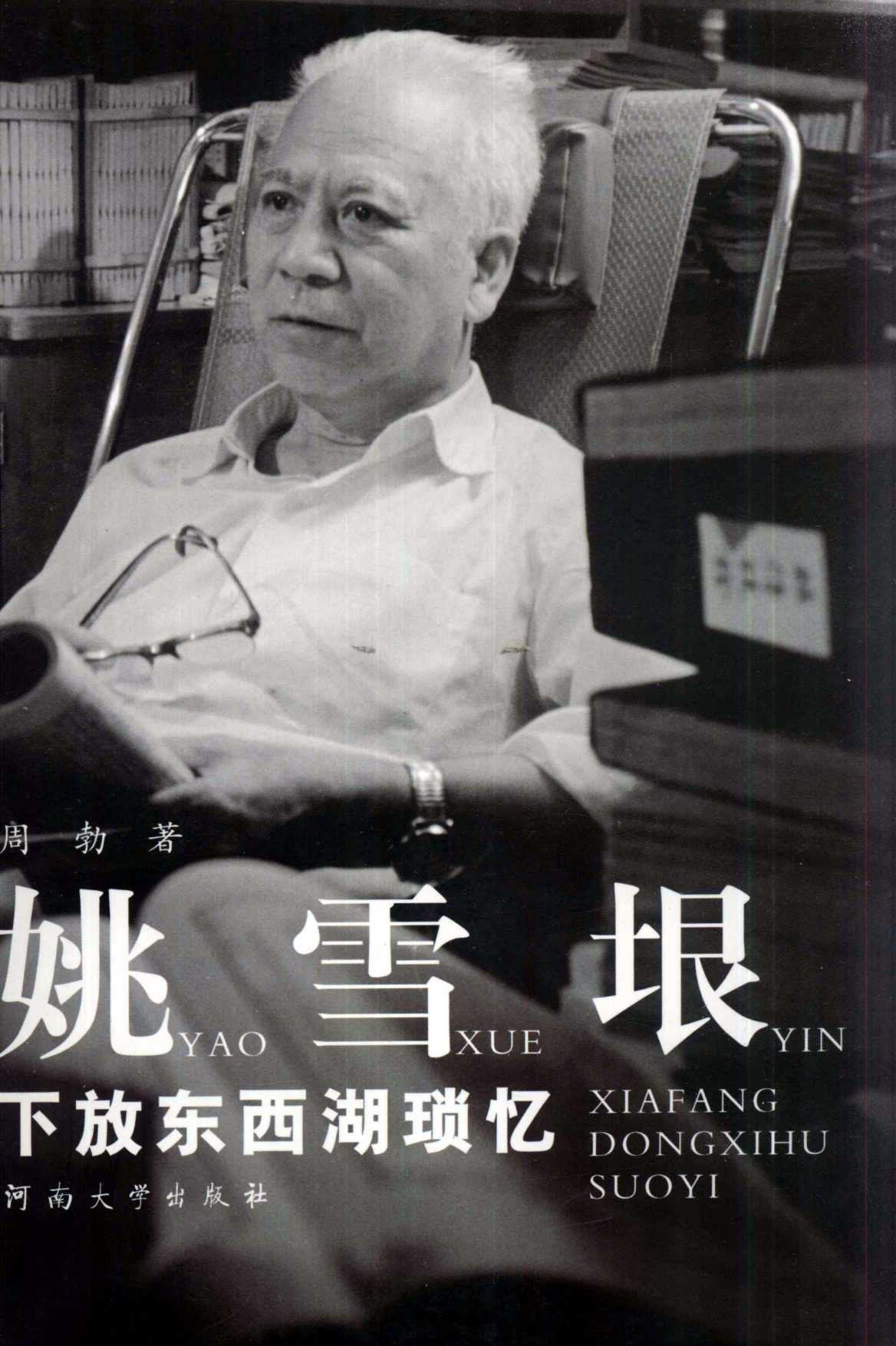




周 勃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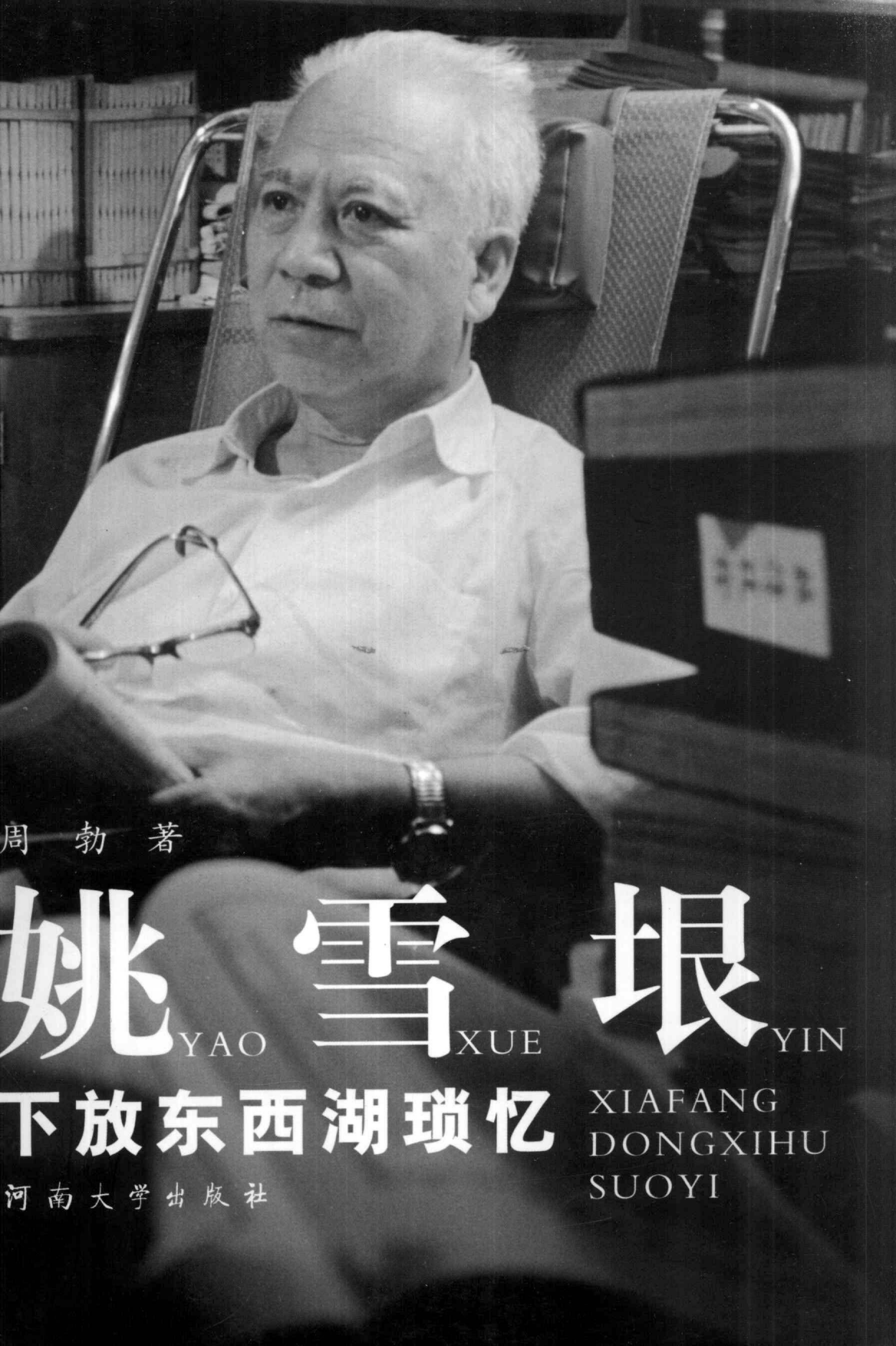
姚雪垠

YAO XUE YIN

下放东西湖琐忆

XIAFANG
DONGXIHU
SUOYI

河南大学出版社



周 勃 著

姚雪垠

YAO XUE YIN

下放东西湖琐忆

XIAFANG
DONGXIHU
SUOYI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雪垠下放东西湖琐忆 / 周勃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649-0253-7

I. ①姚… II. ①周… III. ①姚雪垠(1910~1999)——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5629 号

责任编辑 胡长瑞

责任校对 马素菲

封面设计 王四朋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郑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 1 夏季的形势(之一) 1
- 2 夏季的形势(之二) 9
- 3 “右派就该吃苍蝇?” 24
- 4 在覆没中寻觅生机 38
- 5 鉴定会——运动的常态化 45
- 6 在大忙季节里 58
- 7 沉重的摘帽大会 69
- 8 写《李自成》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 88
- 9 由心情抑郁到感觉良好 107
- 10 告别东西湖农场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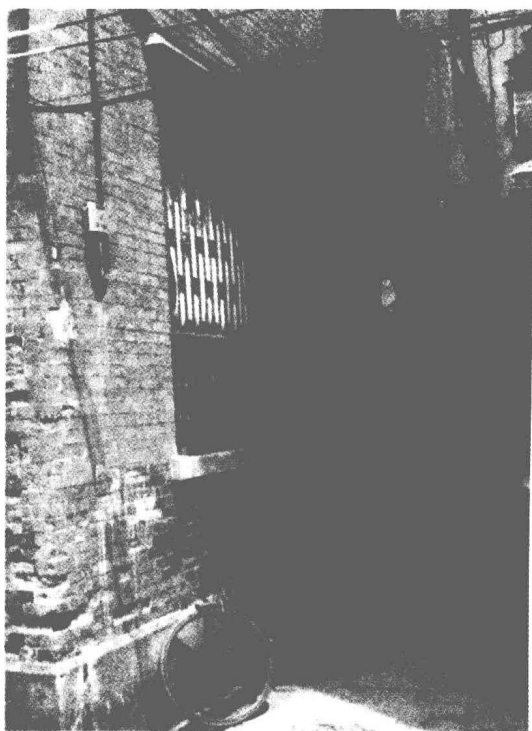
夏季的形势(之一)

1956年初夏,珞珈山上已是浓荫蔽天,蝉声噪耳,我们中文系1952届的同学正面临毕业分配。人们常说,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向了经济和文化建设,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政治环境逐渐松动,人际关系趋向正常,民主空气开始形成,思想解放运动如阵阵春雷在500多万知识分子的心灵中缓缓滚动。对于这些,我们这些面临人生道路重大抉择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虽然也感到分外鼓舞,但更为现实的是如何能分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有的同学想考研究生,有的想搞文学创作,有的想留高校执教,有的则想当一名编辑、记者。分配方案还未下来,何去何从,难以逆料。上面强调的是服从国家需要,我们则是期盼好运来。

为了填充时间上和心理上的空白,大家将时光消磨在读小说上,一摞摞借来,一摞摞还去,古代的、外国的名著

读腻了,就关注当代题材,而当代题材中阅读频率最高的要数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年毛泽东批评了党内领导层的“小脚女人”,于是就出现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赵树理捷足先登地反映这一现实。《三里湾》一出版,评论界呼声很高,对于这位在解放区便被誉为代表工农兵方向的作家,这自应是正常的。但是大家总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过去只能“腹诽”的事,今天气氛不同,就敢于议论了。《三里湾》虽然写了重大现实题材,却没有写出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写出新的英雄人物,特别是没有写出能够教育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精神。按实际说,赵树理是一位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成就也许正在于淡漠了上述要求,但是,既然树为代表方向的作家,就不能不用方向的规范来要求了。叽叽喳喳的议论与争执,促使班委会作出决定,请一位熟悉农村的作家来讲讲。任务落在高定鼎和我的头上,我们到了中国作协武汉分会,接待的同志告知,驻会的作家全都下农村去了,只有姚雪垠因眼睛被走道上的钩子挂伤了,没有下去,现在伤已好了许多,尚在将息。我们决定请他了。

姚雪垠住在车站路伟英里21号,那是一幢旧式三层楼公寓,他住在一楼紧



20世纪50年代汉口伟英里武汉作家协会宿舍。1957年姚雪垠被错划为右派后,在临窗居室开始创作《李自成》。

靠大门的一间房内，大门和房门都敞开着，我们走进去，见他正伏在书案上写作。白天开着台灯，房子显得幽暗而潮湿。领我们去的同志介绍以后，姚雪垠用爽朗的笑声迎接了我们。他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宽阔的前额下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目光犀利，炯炯有神，显示出坚毅和智慧。他穿一件半旧衬衣，洁白平整，灰色毛料西裤，线条笔直。我暗自思忖，他笔下的牛全德、“差半车麦秸”给人的印象是那样邋遢，而这位中原作家，竟然是这样整洁、干净。

高定鼎向他说明来意，请他给我们讲《三里湾》。他听了不假思索地回答：

“《三里湾》我没细看，只翻一翻，没有什么可讲的，我不想讲。你们刘绶松老师不是讲新文学史的吗？你们请他讲吧！”

没想到刚开口就碰了钉子，我和高定鼎瞠目相视，场面非常尴尬，作协的同志也趁机溜了。良久，高定鼎又说：

“姚先生，我们今天是慕名而来。你在华师讲新文学史，反应很好，同学们非常希望在毕业之前能听到您的讲课。”

“啊？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华师讲课的情况？你们有人去听了吗？”

“您讲课的那个班，和我们是同届，我们经常举行联谊活动。华师的同学介绍他们学习情况时，谈到您的讲课对他们很有启发，一些素有歧见的陈旧话题，您都讲得很有见解，也比较公正……”

我还未说完，高定鼎马上抢过去说：

“现在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苏联有一篇小说写了农庄女青年娜斯佳，对我们很有启发，她那种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束缚、敢于向习惯势力挑战的精神使我们很佩服。现在文学方面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感觉到了，却说不清楚，能说清楚的又不敢说。姚先生讲《三里湾》，可以联系当前大家关心的文艺问题，也可以联系您的创作经验，还可以联系娜斯佳精神给我们讲一讲。您在华师怎么讲，也可以在我们那里怎么讲。姚先生当过教授，很了解我们大学生的求知渴望，希望您不吝赐教。”

高定鼎说得有点激动，情不自禁地搓着手站了起来。我不能不惊服高定鼎的机灵与口才。果然，姚雪垠快乐起来，他一边豪爽地笑着，一边说：

“好，好，我答应你们。先讲讲《三里湾》，再讲讲我的创作情况，也顺带谈谈我对许多理论问题的看法。你们大概只知道我是作家，并不知道我写了不少理论文章，还是一位文艺理论家吧。”

我回答说：

“我读过《小说是怎样写成的》。这部理论集除了介绍您的创作经验，也谈了不少文艺理论问题。您前年写的关于《儒林外史》思想性的文章，也是很有见解的论文……”

姚雪垠不等我说完，便接着说：

“那篇谈《儒林外史》的文章，可把我写苦了。手边什么资料都没有，完全凭记忆，凭青年时代下过的一点苦工夫写的。”



在大夏大学任教时的姚雪垠。

说时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接着，他又告诉我们他在华师住了近两个月，一边讲课，一边体验大学的生活，准备写一部长篇，暂定名《青春》，已写出了其中一章《实习的第一课》。他到华师中文系讲现代文学是因为原来的教师被划为“胡风分子”，不能再讲课了，系里为了肃清影响，要他从五四开始梳理一遍。他说他过去在大夏大学开的是“小说创作原理”，没有讲过新文学史，好在自己比较熟悉，所以也没太大困难。接着，我们商定了作报告的时间便告辞了。

姚雪垠作报告这天是星期六，学校晚上要在小操场放映电影《渡江侦察记》，同学们都希望报告会按时结束，不要拖延时间。下午2时整，老图书馆一楼阅览

厅已座无虚席，姚雪垠准时开始了他的报告。他对《三里湾》作了热情而周到的肯定，首先是题材的现实性，其次是赵树理将民间说唱与现代小说的有机结合，再次是小说中体现的质朴、幽默、乐观的创作风格。而对《三里湾》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赵树理对长篇小说缺乏驾驭能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二是对生活的反映比较浅，缺乏历史的深度把握。有同学递纸条请他谈谈《三里湾》

没有写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写新的英雄人物,而赵树理则被誉为代表工农兵方向的作家,戴着许多顶桂冠,这应该怎么解释。姚雪垠拿着纸条看了看,没有回答,而是掉转话题说:

“我现在想谈谈我自己的创作和对有关创作问题的一些看法。”

停了一下,他接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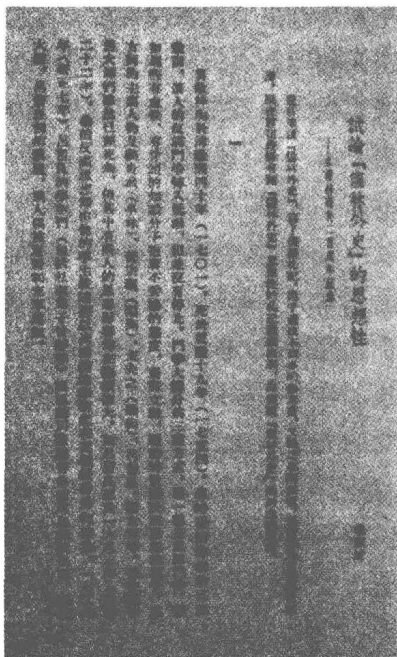
“近年来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两部长篇小说上。一部叫《捕虎记》,内容是写思想保守的老工人和青年工人的矛盾,后来揭露了从中挑拨的阶级敌人,矛盾也就解决。另一部书名《白杨树》,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倾全力于欧洲战场,给中国民族轻工业造成了发展机会,有一部分官僚地主家庭向轻工业投资,向民族资本转化。我着重写了两个家庭,塑造了不同时代的三代工人形象。”

接着他为我们叙述了工人家庭的悲惨而又悲壮的故事。他叙述故事的才能确实令人佩服,他不仅叙述得脉络分明、详略得当,而且在讲述时感情充沛、形象生动,往往讲到动情处,他饱含着热泪,引得满座一片唏嘘。他接着说:

“工厂门前有一条河叫做卫河。卫河的南岸原是乱坟岗,埋葬的都是工人,他们死于饥饿、疾病和反动派的枪杀,这是一部中国工人阶级活的血泪史。如今兴建为公园,栽种一排一排的白杨,苍劲挺拔,直指苍穹,象征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坚韧和英勇,因此小说取名《白杨树》。”

“但这部作品得不到支持。理由是在前一发展阶段没有写党的领导,而后面虽然写了党的领导,但你没当过地下党,没有经验,怎么能写好?就这样,这部作品被扼杀了。”

姚雪垠停顿下来,竭力抑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听众席里轻轻发出了唏嘘声。他喝了一口水,稍微平静一下,然后转向一些理论性话题,例如作家的知识结构,作家旧的生活经验是财富还是包袱,作家一般的生活经验有没有阶级性等。姚雪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很明



姚雪垠的文章《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

显是与传统的看法不一致的,在听众中引起的反响也是不同的:有人窃窃私语,有人在传递条子,也有人慢慢退出会场。姚雪垠这样的说法,在政治课和团课中是听不到的,困惑和疑虑困扰着一些听众。姚雪垠在讲完作家的新的生活经验和旧的生活经验之后,接着又讲了作家的直接生活经验和间接生活经验,在谈到后者时,他特别强调作家要有丰富的书本知识,要努力读书,学无止境。他说:

“有朋友劝我,不要再读线装书了,说我脑子里封建东西够多了。他是把旧的书本知识看成包袱,而不懂得这也是无法用金钱买来的财富。我们几千年丰富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很大部分就蕴藏在书本里面,如果将这些东西抛弃掉,还谈什么接受遗产?我们大规模文化建设的高潮就要到来,在座的同志们都肩负着文化建设的使命,如果我们是一个上无祖宗、下无子孙的世界主义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吗?……”

这些讲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听众中发出掌声。姚雪垠有过教学经历,他善于从听众情绪中获得反馈,用来调整自己讲话的内容、节奏和姿态。他将书本知识的重要性讲得精辟透彻、幽默生动,接着讲独立思考,反对盲从,从教条主义和旧的习惯势力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澎湃高潮讲到文艺界的教条主义和习惯势力。他批评文学创作的现状是“题材狭隘单一,内容千篇一律,风格单调,形式呆板,矛盾虚假,形象苍白,英雄人物不可亲,阶级敌人不可恨”。他将教条主义称之为“文学界大大小小的‘孔代表’们”。

“由于他们手中拿着一支红笔,可以给一部作品一条生路,也可以判一部作品死刑。如果他们像况钟那样善于调查研究,倾听各种意见,细心阅读作品,慎重处理作品,那就大大有利于发展创作,有利于出现百花齐放;如果他们像过于执那样专横独断,固执己见,将马列主义和上级指示当成教条,那就大大有害于党的文学事业,使文学创作走向僵化和衰败。当前,许多矛盾被揭开,过去只敢‘腹议’的问题,已开始形成公开争论,再加上广大读者的新的要求,都推动着我们的不断进步,我相信那些大大小小的‘孔代表’们,他们在澎湃的新形势面前,会改变他们的看法。

“你们临近毕业,有许多同志会走进我们文学界来,希望你们成为文学肌体中新的血液。你们很钦佩苏联集体农庄女青年娜斯佳,娜斯佳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冲破陈规陋习和保守思想,努力接受新鲜事物,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敏感。希望你们将这种娜斯佳精神带到工作岗位上去。”

听众中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报告到5点钟准时结束,同学们拥上前来请他签名。虽然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姚雪垠仍然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地为一个个同学签上自己的名字。高定鼎拿着12元钱走近他说:

“这里是讲课费10元,车费2元,太少了,对不起,还要请您写张收条。”

姚雪垠一边写收条,一边笑着说:

“讲课还要给钱,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

同学们哄然一笑。

高定鼎因要收拾阅览室,要我陪送姚雪垠。我陪着他从图书馆漫步走向12路公共汽车站。太阳快要西下,而将它的余晖投在参天的梧桐树上,浓绿的树叶在微风中闪烁着点点金光。姚雪垠连声赞道:

“珞珈山真美,真是太漂亮了!”

接着他又和我谈起文学理论近况,我谈到《收获》作者尼古拉耶娃的论文《论艺术文学的特征》在中国颇有影响,她对形象思维的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姚雪垠一边走,一边很专注地听着我的讲话。这时我们已走到体育馆,远远看到12路汽车站排着长长的等车队伍,姚雪垠无可奈何地说:

“这么长的队呀,什么时候能走呀?”

“今天星期六,又正值下班高峰,等一会儿就不挤了。”

姚雪垠指一指汽车站对面的空阔草坪说:

“我们干脆到那里坐一坐,一边聊着一边等车吧。”

我这才发觉他现在确实很累了。我们坐在草地上,草地中间有个简陋的亭



1938年3月,姚雪垠受中共河南省委派遣赴武汉参加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创作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发表于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第1卷第3期,轰动抗战文坛,成为姚雪垠的成名作。

子，匾上写着“六一亭”，那是为纪念“六一惨案”死难同学而建的。姚雪垠没有观赏周围景物，却突然问我：

“你对胡风的形象思维论怎么看？”

“胡风对形象思维的看法，曾在许多文章中表述过，有的直接谈形象思维，有的则在谈别的问题时涉及。总体说，他与尼古拉耶娃的观点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我仓促地做出上述回答。

“胡风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截然分开、艺术认识和科学认识完全割裂，必然导致否定理性的作用，显然是错误的。尼古拉耶娃有与胡风一致的地方，但不能因此就证明胡风观点的正确。”

我与姚雪垠还只是初相识，不便正面与他争论，只好换一个话题谈：

“最近我读巴人《文学论稿》，他对作家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表述是作家首先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进入创作实践，哲学家、社会家的认识只走两步——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而作家则有第三步，由理性认识再还原为具体感性形象。正是这样一种表述，使得公式化、概念化才能够乘虚而入，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也都与此有关。”

姚雪垠望着我笑而不答，也许他正在思考，也许他压根儿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就不再说下去了。

这时车站已没有排队的乘客了，一辆公共汽车朝车站开了过来。

“车来了，车来了，我们以后再找机会谈吧。”他一边说，一边向车站奔去。

姚雪垠此次的报告是成功的，他的豪爽和坦率获得了青年们的赞赏，而在反右派斗争中据以定罪的几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在这次讲话中已初露端倪了。听他的报告，听他报告中流露的愤懑，可以想见教条主义对他的迫害所引起的反响。

在与姚雪垠的接触中，他没有问，我也没有主动将我的名字告诉他。世事沧桑难自料，一年多以后的反右派斗争中，我竟与他邂逅于武汉作协食堂，那时他刚刚从北京回来。他久久凝视着我，面熟却又想不起来。我轻轻说了一句：“我是从武大分来的。”他想起来了，但眼神立刻变得警觉起来，他可能想到他在武汉大学的报告是陷他于罪的好材料，而且还可以加上“毒害青年”一条。我趁他再见到我时，报以善意的、友好的微笑，他似乎释然。从批判姚雪垠开始一直到我们下放劳动前，我们没有打过招呼，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我们是陌生人。

2 夏季的形势(之二)

1957年6月,中国作协武汉分会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虽然比社会上晚一步,但一开始便如火如荼。

武汉作协共有员工40多人,除去后勤和勤杂工,实际上干部和业务人员只有30多人。1956年政治环境的宽松,双百方针的提出,民主空气的形成,使这些从事着意识形态工作的人们很快敏感到这种气候的变化。他们对许多重大文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对领导的不良作风敢于提出批评。共青团支部还设立了“青年监督岗”,对机关的不好现象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评。6月8日《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犹如晴天霹雳,将大家都打蒙了,一切是非、正邪、善恶,一时失去了原有标准。除了“变色”者外,大多数人都处于忧虑、困惑、疑惧之中。当听到振振有词批判某一句右派言论时,人们不禁自问:“我不也说过这样的话吗?”当指斥某一句话为恶毒攻击时,人们暗暗相觑:



姚雪垠夫妇。

“这句话不是以正面方式传达过的吗？”这种彼此彼此、清浊难分的混乱局面，使得运动领导者们要分清左、中、右，划清思想界线，组织战斗队伍，十分困难。作协一位副秘书长（也是运动领导者）在一次动员会上出台了一项政策：

“同志们都有大大小小的辫子，这个事实不容否认。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只要大家大胆揭发，积极参战，自己将辫子揪下来，就证明你的立场站过来了。如果自己不站起来，在揭批右派中揪掉自己的辫子，让别人揪住，就难办了。”

政策一出台，反右大旗下就站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过去会场一片寂静，现在群情激奋，踊跃发言。但是毕竟是文化单位，整个反右派斗争文明而理性，全机关没有贴大字报，没有拉横幅、贴标语，没有人领着呼口号，但是，这些“和平”现象并不能掩盖斗争的惨烈与残酷。武汉作协 30 多名在册干部（包括作家、编辑）中，划右派 10 名（其中 5 名极右派）。团支部共有团员 11 名，被开除团籍 7 名。《长江文艺》编辑部共有编辑 17 名，划右派 7 名。当然，也正如领导人所说，和全国 6 亿人比起来，这毕竟只是“一小撮”。

我是 1956 年 10 月由中国作协创委会调到《长江文艺》编辑部的，12 月，我发表了长篇论文《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文章先受到赞扬，

随着形势变化,文章和作者遭遇渐惨,在受围攻中,帽子常新,最早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因此文为国外转载,又改为国际反共浪潮在中国文艺界的反映,最后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大小会上都一再强调要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要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但是越是假的越做得认真,越是强调区分的越没区分。1957年11月21日才正式对我进行批判,但在此之前,我已经被暗中划入另册了。当时我还只是20多岁的青年,未谙世事,尤其不懂政治,我只是以我所视所听和思维去观察与思考反右派斗争中的一切。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姚雪垠尚羁旅京华,他先住北池子,后来移居西山八大处五处。《旅行家》主编彭子冈约请姚雪垠写北京景点的系列散文。她深知姚雪垠是一位历史知识丰富、文采斐然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从已发表的散文看,姚雪垠常将历史旧话与今日视点、山川之美与时代之美和谐地融合起来。他以新的历史观照亮古迹,又以怀古之思张扬爱国激情,因而深受读者欢迎。姚雪垠已经写了景山、卢沟桥,准备再写长城、官厅水库、十三陵等。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修改《捕虎记》,虽然他自己并不满意这部作品,但因作协领导垂青,他得耐心地改下去。

姚雪垠目前的心绪很不好,反右派斗争风声日紧,他忧心如焚。他翻阅全国各地报纸,注意斗争动向,研究政策变化。他的一批老朋友,彭子冈、徐中玉、程千帆、李长之等都纷纷中箭落马,被划为右派,他不禁胆战心惊,冒出一身冷汗。但是他将报纸上披露的言论和自己的文章和发言相比较,觉得它们既存在相似之处,也有很大差异。首先,他觉得自己动机不同。他认为自己的动机是响应党的号召,完全为了帮助党整风,矛头对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虽然文章和发言中有些话说得太尖刻、太直白,但并不掩盖动机的纯正。其次,他想到言和行的问题。批判《文汇报》那篇文章特别指出“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这就是行。而自己一直守着多年的习惯,不串门,不聊天,言不及义的话他不说,而是兢兢业业,伏案用功,这个好习惯使他获得了许多读书时间,也使他免去许多麻烦。再次,他想到自己一贯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对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措施从来都是拥护的,只是在文学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意见,其目的也是为了发展党的文艺事业。这和“党天下”、“轮流执政”、“成立政治研究院”是不同的。

姚雪垠又想到毛泽东读了他的文章的评语。他没有直接听到这个评语的

传达,几位朋友的转述使他大致有些了解。

1957年的初春,毛泽东在紫光阁召见文艺界负责同志和著名文艺家座谈文艺问题,从晚上8点谈到12点,毛泽东谈兴很浓,而且事先他读过不少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因此他对文艺情况比较了解。谈话涉及了许多问题,如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写悲剧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写真实问题,讽刺性杂文还能不能写的问题。在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了《惠泉吃茶记》,文章写得不错,作者很会写文章,只是思想上有君子小人之分,瞧不起劳动人民,流露出知识分子的清高,“众人皆醉我独醒”,有一种郁郁寡欢情绪。接着他又问到姚雪垠的写作和待遇等情况,周扬等都做出了回答。

在谈到百家争鸣和以理服人时,毛泽东说到《文汇报》发表了姚雪垠的《创作问题杂谈》,在上海引起了围攻,他说他并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但围攻的文章也没有说服力,至少他就没有被说服,只有姚文元的文章有说服力,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涉及了许多作品和评论,如《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草木篇》等,他对这些作品和评论的态度是很不相同的,有的是嘲讽的批评,有的是正面的、善意的批评,也有的是严厉的批判式批评。姚雪垠觉得对他的批评是善意的。他想着朋友们常常批评自己骄傲、自负、狂妄,毛泽东的批评正是抓住了自己思想改造的症结所在,自己今后要下定决心克服这个毛病,要虚心向群众学习,活到老,思想改造到老。姚雪垠又回忆起前年他在武汉作协肃反审干以后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在我的生活道路上,我曾经有过许多错误和问题,每次都在党的帮助下获得改正。党是我最伟大的精神母亲,我请求我的母亲从严要求我,在我有错误时,用鞭子抽我,狠狠地抽,哪怕抽出血来,决不姑息。”姚雪垠清楚地记得当时说这番话的情景与心情,现在反右派斗争开始,自己写的文章错误很多,一定要请党狠狠用鞭子抽打自己,自己一定要经受住这次抽打,哪怕抽出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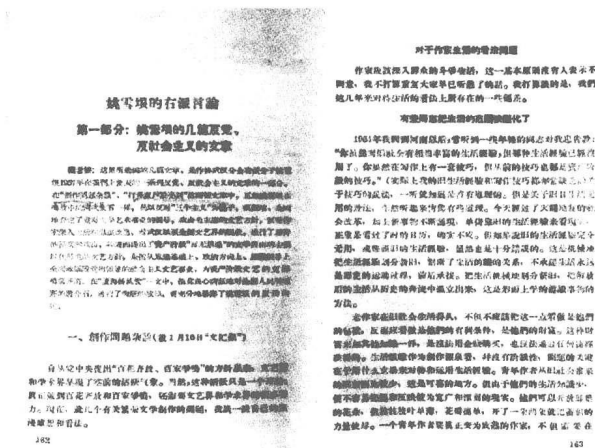
姚雪垠有个习惯,心情一紧张就做噩梦。医生劝他不要仰卧,尤其不要将手放在胸脯上。他遵医嘱,每晚侧身睡,但仍做噩梦。现在觉得心情稳定一些,有些倦意,便侧身而卧,哪知刚一合眼又惊醒过来。每次噩梦,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遭受批判。难道自己此次真的不能幸免?真的要被划为右派?姚雪垠脑子里萌生出一种最坏的设想:如果划了右派怎么办?

他首先想到自己有着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三个孩子上学,生活费、学费是

一笔很大的开支,如果自己工资降了,主要靠妻子王梅彩一份教师工资收入怎么够?他又想到一旦戴上帽子,政治包袱有多重,影响有多远,不仅连累王梅彩,更影响子女的前途和出路。但他转念一想:“不是有‘外部矛盾,内部处理’、‘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等一系列政策吗?党怎么会丢掉这一批知识分子呢?延安整风,不是也批判了许多同志,后来不都没事了?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吗?没有。我只要求让我继续从事创作,我就用我的笔为党为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即使工资降低了,靠稿费也可以维持温饱。”

姚雪垠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但同时也常在作品中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常沉浸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替与融会之中。当执著于自己的事业时,他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而当需要鼓起风帆、迎着风雨前进时,他又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当面对严酷的反右派斗争时,他常陷入痛苦、恐怖和忧虑之中,而当预测着自己的前途时,他又不能不尽量找出一点亮色。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

“我是一个情绪化性格的人,激怒、狂躁、哀戚、悲愤、痛苦、愤恨、欢欣、哀愁等情绪,在我身上极易触发。我写人物的遭遇,情绪一旦触发便和人物融为一体,我一边写着,一边痛哭,总是与我的人物共患难、同苦乐。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总要找出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或者逢凶化吉的可能,鼓舞自己面对挫折。如果我没有这种乐观精神,没有坚强的自信力,我就会垮下来,什么事也干不成了,我的事业也完了。当然,情绪化的性格也有不好的一面,我常因情绪激动,发言时开罪领导,惹出祸来,有时也因此得罪朋友,还有时因此做出一些错事。



反右时姚雪垠被作为右派言论批评的文章。